

毗伽可汗宝藏 与中世纪草原艺术

Treasure of Bilge Khagan and the Steppe Art of Middle Ages

撰文 / 林梅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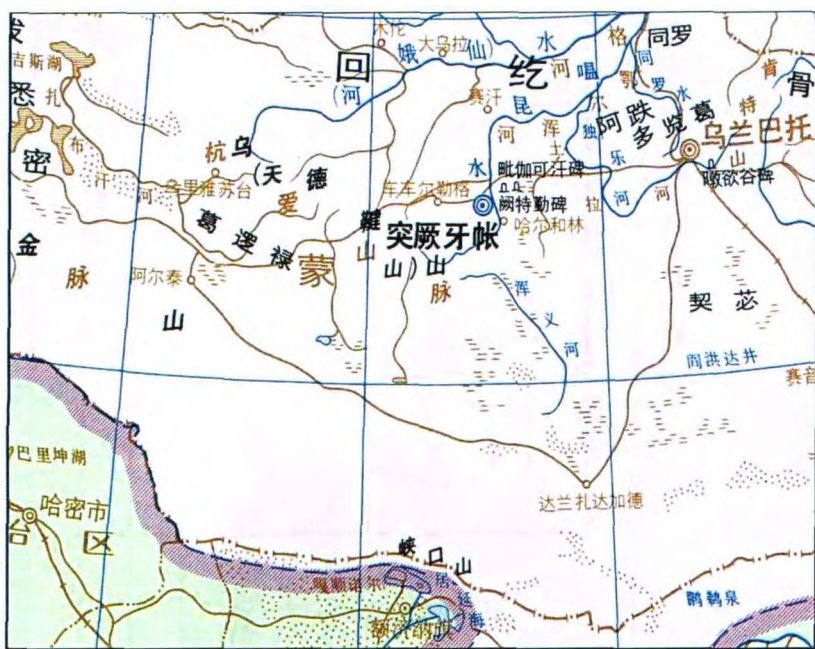


图1 毗伽可汗陵园的位置

毗伽可汗宝藏的发现

6世纪中叶，柔然汗国原来的“锻奴”——突厥人从阿尔泰山南下，546年灭高车，552年破柔然，成为蒙古草原的新主人。567年，突厥人与萨珊波斯共灭嚧哒，以阿姆河为界，瓜分嚧哒故地。于是，一个庞大的草原帝国——突厥汗国在中国北方迅速崛起，所辖疆域东起辽河上游，西至阿姆河，南达鄂尔多斯，北抵贝加尔湖（图

1）。此后，突厥人相继建立两大王朝，史称“第一突厥汗国”和“第二突厥汗国”，后者亦称“东突厥”或“蓝突厥”（Kok Turks）。734年，东突厥毗伽可汗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部下毒死，突厥人从此陷入长期内战。在经历了几个短命的可汗之后，九姓回纥与拔悉密、葛逻禄联兵，最终在745年推翻了不可一世的突厥汗国（图2）。

早在19世纪末，俄国考古学家就在蒙古故都——哈

喇和林之北大约45公里的鄂尔浑河畔发现突厥可汗陵园，但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一直在可汗陵园地面矗立的突厥碑铭，更能说明突厥物质文化的地下陵墓却很少有人关心。这个僵局终于在2001年被土耳其和蒙古联合考察队打破，他们在毗伽可汗陵园内发现数以千计的金银珠宝，今称Treasure of Bilge Khagan（毗伽可汗宝藏）。这个发现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我们开始进入突厥考



图2 突厥汗国统治中心——鄂尔浑河

古的一个新时代。

2001年8月至9月，土耳其和英国相继发布消息：由土耳其和蒙古学者组成的“突厥碑铭研究计划”（MOTAP）联合考察队，在鄂尔浑河畔突厥可汗陵园内发现了一个中世纪宝藏。

突厥人是土耳其人的祖先，公元11世纪从中亚移民到今天的土耳其，所以土耳其人把突厥古物视为自己祖先的文化遗产。据报道，“突厥碑铭研究计划”是土耳其前总统苏莱曼·德米热尔1995年访问蒙古时启动的，旨在研究和保护蒙古高原的古代突厥文化遗产。考察队近年不断开展突厥可汗陵园的考古工作，一个由46人组成的科学考察队具体执行研究计划，其中包括了35名土耳其科学家和11名蒙古科学家。受蒙古高原气候条件的限制，考察队只能在7、8月份进行野外作业。毗伽可汗（716—734）和阙特勤陵园位于蒙古首府乌兰巴托西约450公里，两个陵园内至少有九座陵墓，而位于乌兰巴托东南60公里巴彦楚克图的突厥老臣噶欲谷陵园只有一座陵墓。考察队2001年的工作重点是在发掘毗伽可汗陵园，他们还计划对阙特勤和噶欲谷陵园进行考古发掘。

考察队于2001年8月1日进入毗伽可汗陵园，陵园内最显著的地面建筑是毗伽可汗巨大的墓碑（图3）。突厥汗国灭亡后，此碑遭到仇敌的严重破坏，打成许多碎

块。考察队首先将墓碑的三个主要碎块进行拼合，然后开挖陵园内各类遗存，结果取得重要发现。发掘工作尚未结束，就发现2800件金银珠宝，出土遗物可分金器、银器、铁器、铜器、宝石、纺织品等六大类。据说整个发掘工作结束后，出土文物总数预计可达4000多件。

安卡拉大学的突厥学家高美茨（S.Gomec）参加了可汗陵园的整个考古发掘过程，他披露了更多的内幕。这批金银珠宝是在毗伽可汗陵园内一个宗庙基址下发现的，数千件宝物皆出自宗庙下埋藏的一个百宝箱（图4）。据初步统计，百宝箱外装饰的各类银花多达1850片，箱内则满载各种金银器皿、黄金动物塑像、金腰带、金冠、金牌饰、金耳环等。此外，出土遗物中还有许多名贵宝石、丝绸残片、铜钉、铁饰件残片等。金器类最重要的发现，莫过于带有神鸟浮雕的黄金王冠，上面镶嵌了一颗象征王权的名贵宝石。金腰带亦为突厥可汗王权的象征，几乎



图3 毗伽可汗陵园内巨大的墓碑



图4 毗伽可汗陵园内祀庙基址发掘现场



图5 毗伽可汗石像上雕刻的腰带

与陵园内毗伽可汗石像上雕刻的腰带(图5)完全相同。这些象征王权的黄金艺术品的发现,使发掘者确信这个宝藏属于毗伽可汗私人所有。无论如何,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因为这毕竟是考古学史上首次科学发掘突厥可汗陵园。据说,出土文物已经全部移交蒙古政府,目前收藏在乌兰巴托国家历史博物馆(土耳其阿纳多卢新闻社、路透社记者的网上消息)。

关于毗伽可汗之死,《旧唐书·突厥下》说:“毗伽可汗以开元四年(716)即位,本蕃号为小杀……二十年,小杀为其大臣梅录啜所毒,药发,未死,先讨斩梅录啜,尽灭其党。既卒,国人立其子为伊然可汗。诏宗正卿李佺往申吊祭,并册立伊然,为立碑庙。仍令史官起居舍人李融为其碑文。无几,伊然病卒,又立其弟为登利可汗。”故知毗伽可汗是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手下毒杀的。国人先立伊然可汗,但是新汗国祚不长,就暴病而亡,突厥人不得不改立毗伽可汗的另一个儿子登利可汗(《新唐书·突厥下》所述略同。文中说:“毗伽可汗默棘连,本谓‘小杀’者,性仁友,自以立非己功,让于阙特勒,特勒不敢受,遂嗣位,实开元四年……默棘连请昏既勤,帝许可,于是遣哥解栗必来谢,请昏期。俄为梅录啜所毒,忍死杀梅录啜,夷其种,乃卒。帝为发哀,诏宗正卿李佺吊祭,因立庙,诏史官李融文其碑。国人共立其子为伊然可汗。”)。《资治通鉴·唐纪》将毗伽可汗的卒年系于开元二十二年(734),那么唐朝使臣李佺为毗伽可汗建碑立庙的时间应在公元734年。

毗伽可汗的墓碑用花岗岩制成,与阙特勤碑

相距一公里。两碑同在蒙古国后杭爱省和硕柴达木盆地的鄂尔浑河流域,故称“鄂尔浑碑”(Orkhon Inscriptions)。和阙特勤碑一样,毗伽可汗碑用突厥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刻写。汉文由唐朝史官李融书写,今已漫漶不清,仅存“登利可汗虔奉先训……因使(李)佺立于庙,纪功(于)石,以昭示子(孙)”寥寥数语。(李文田撰、罗振玉校订:《和林金石录》,灵鹊阁丛书第四集,长沙石印,大约刊于清末,无确切出版社年月)。突厥文由毗伽可汗的外甥夜落纥特勤所书,保存较好,凡80行,主要记述毗伽可汗生前的文治武功(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vol. 69; 1968; 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263-269页)。土耳其和蒙古考察队在毗伽可汗陵园内发掘的祀庙,正是李佺为毗伽可汗所立“碑庙”。显然,这所祀庙下埋藏的金银珠宝皆属于毗伽可汗私人所有,埋藏年代则在公元734年李佺为其立庙之时。

这个宝藏的正式考古报告目前尚未发表,海内外的新闻报道也只有文字资料。日本广播电视协会(NHK)的后藤先生,为了考察毗伽可汗宝藏,于2004年夏专程到乌兰巴托国立历史博物馆访问,并给我们带回许多毗伽可汗陵园的现场发掘照片和出土文物照片。毗伽可汗宝藏主要为金银宝钿,可分突厥式和粟特式两大门类。例如:黄金腰带、神鸟金冠、鎏金银鹿雕像、单把鼓腹金壶、鼓腹银罐和金盘碟等,属于突厥本土草原艺术;而金银细颈胡瓶、单把杯、金银花和金耳环等,则属于中亚粟特艺术。

鎏金银鹿与突厥人的“苍狼白鹿”创世说

毗伽可汗宝藏中有两个鎏金银鹿(图6),堪称中世纪草原艺术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就目前所知,草原工匠制作金鹿雕像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2000年,德国考古队在俄罗斯图瓦共和国阿尔赞附近山谷发掘了一座巨大的古代游牧人陵冢,为了和阿尔赞以前发现的游牧

人陵冢相区别，今称“阿尔赞2号墓”。德国考古队从中发掘出数以千计的金银艺术品、铁器、青铜器和古代纺织品。单是黄金艺术品就达4700多件，包括一个制作精美的金鹿权杖（图7），年代约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德国学者将这座墓的年代定在公元前6-5世纪（M.Edwards, “Siberia’s Scythians: Master of Gold,” National Geographic, No.6, 2003, p112-129）。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也发现过“立鹿”或“卧鹿”青铜像（图8），年代在战国晚期。

突厥人全面继承了蒙古草原古代游牧人文化，毗伽可汗为亡弟所立阙特勤碑的碑额上，就刻有族徽或图腾性质的立鹿符号（图9）。显然，这个习俗源于突厥人古老的“苍狼白鹿”创世说。

《周书·异域下·突厥传》记载：突厥祖先“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

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在狼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正因为如此，突厥人把苍狼当作自己的祖先，第一突厥汗国即以苍狼为图腾。佉钵可汗陵园所立布古特碑额上的狼雕，就根据这个古老的突厥创世说而雕琢（林梅村：《布古特所出粟特文突厥可汗纪功碑考》，《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67-74页；收入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苍狼创世说来源甚古，匈奴、高车等与突厥同族的游牧部落中，也流行这个传说。《魏书·高车传》记载：“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其



图6 毗伽可汗宝藏中的鎏金银鹿

图7 俄罗斯图瓦共和国阿尔赞古代游牧人陵冢出土金鹿权杖

图8 鄂尔多斯青铜鹿
(田广金等编《鄂尔多斯青铜器》)





图9 阼特勤碑上的“立鹿”符号

小女曰：‘吾父使我处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神物天使之然’。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繁衍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

另一方面，突厥人还把金角白鹿当作自己的祖先。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境异》记载：“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异，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经数十年。后部落将大猎，至夜中，海神谓射摩曰：‘明日猎时，尔上代所生之窟，当有金角白鹿出。尔若射中此鹿，毕形与吾来往，或射不中，即缘绝矣。’至明入围，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围，将跳突围，遂杀之。射摩怒，遂手斩呵嚩首领，仍誓之曰：“自杀此之后，须人祭天。”即取呵嚩部落子孙斩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蠹，常取呵嚩部落用之。射摩既斩呵嚩，至暮还，海神女报射摩曰：‘尔手斩人，血气腥秽，因缘绝矣。’突厥古代传说中的“呵嚩”，指铁勒呵咄部，因嚩、咄二字形近而讹。因此，第二突厥汗国把金角白鹿当作族徽或图腾，阼特勤碑等突厥碑铭或龟趺上往往雕刻白鹿符号，与突厥第一汗国的苍狼图腾形成鲜明对照。因此，我们认为毗伽可汗宝藏中的两个鎏金银鹿，实际上表示突厥人古老创世说中的金角白鹿，而非土耳其学者推测的，两者分别作为突厥

可汗和可敦的化身。《蒙古秘史》开篇说，蒙古人始祖亦为“苍狼”（孛儿帖·赤那）和“白鹿”（豁埃·马阑勒），所有蒙古人都是他们繁衍生殖的后代（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河北人民出版社，3—5页）。看来，突厥人古老的创世说源远流长，后来又为成吉思汗的子孙传承。

突厥可汗的海东青王冠

自古以来，蒙古草原的游牧人就酷爱猎鹰。辽代契丹人尤爱辽东出产的白雕，时称“海东青”。《文献通考》说“海东青者，小而健，能擒天鹅，爪白者尤为异……契丹酷爱之，然不能致”。明初叶子奇《草木子·杂俎篇》说：海东青“善捕天鹅，放飞时，旋风羊角而上，直入云际，能得头鹅者”。海东青学名Haliaeetus Albicilla，属于隼形目鹰科。今称“白尾海雕”，亦名“白尾雕”或“芝麻雕”，主要繁衍于东北三江平原至长江下游，并在黄河以南地区越冬。辽代皇帝每年都派人到女真部落捕捉或索要海东青，用于春捺钵捕天鹅。“捺钵”是契丹语，意为“皇帝离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于是，海东青捕天鹅成了契丹贵族最为流行的一种时尚，并对辽金时期的艺术产生巨大影响。中世纪“春水秋山”的艺术主题就与此密切相关，并对辽金和宋元时代的纺织品图案，玉雕以及和书画艺术产生巨大影响。

1992年，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辽代耶律羽之墓出土了一件海东青鎏金铜饰件，高24.3厘米、宽30.5厘米，耶律羽之葬于辽会同四年（941），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辽代海东青艺术品（图10）。

殊不知，海东青艺术在蒙古草原的出现并非始于辽代，毗伽可汗神鸟金冠上的神鸟，就是一只猎鹰（图11），也即辽代所谓“海东青”。毗伽可汗为亡弟阼特勤所立石雕像上，也雕刻了象征权力的海东青王冠（图12）。公元5—6世纪，称雄蒙古高原的柔然人也把海东青当作王权的象征，东魏茹茹公主墓壁画上就绘有一幅海东青壁画（图13）。

考古发现表明，海东青的艺术形象在草原艺



图10 内蒙古辽耶律羽之墓出土海东青鎏金铜饰件
(现藏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图11 毗伽可汗神鸟金冠上的猎鹰



图12 阙特勤雕像上的海东青王冠



图13 河北省东魏茹茹公主墓海东青壁画(《文物》1984年第4期)

术中源远流长,至少起源于公元前4—前3世纪。例如:春秋战国时期鄂尔多斯的游牧部落酋长,已开始把海东青当作王权的象征,并精心制作了一顶猎鹰雕像的金冠(图14),工艺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突厥金银器

突厥人本为柔然人的“锻奴”,擅长冶金,尤其是锻铁工艺。《隋书·突厥传》说:“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祖灭沮渠氏,阿史那氏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吐鲁番出土文书多次提到的“阿博珂寒铁师”,指突厥可汗御用铁匠。突厥人本来在盛产黄金的阿尔泰山南麓游牧,自然精通黄金加工技术。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提到的“珂寒金师莫畔陁”,则是一位在吐鲁番施展才艺的突厥可汗御用金匠。(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

据东罗马史料记载,突厥可汗喜用金银艺术品。东罗马使臣出访天山北麓西突厥王庭时,突厥“可汗他日接见罗马使臣之二室。其一中有肖像,可汗卧于金床,室设金瓶、金针、金瓮。其一室有饰金木柱,有一金床,四金孔雀负之。门首有车,满载银盘及银制动物肖像”。(沙畹《法》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170页)。然而,突厥工匠制作的金银器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却一直无人知晓。

199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孙机先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根据西伯利亚突厥墓出土金银器和突厥石人所持器皿,从内蒙古出土唐代金银器中分辨出一批突厥或突厥式金银器(孙机:《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孙机先生归入突厥金银器的单耳鼓腹罐和无耳鼓腹罐(图15),



图14 鄂尔多斯金冠(田广金等编《鄂尔多斯青铜器》)



图15 唐代的突厥或突厥式金银器
(单耳鼓腹罐为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出土)



图16 毗伽可汗金银器



图17 青海省东汉匈奴墓出土鎏金银壶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上孙家寨汉晋墓》)



图18 毗伽可汗宝藏中的金钵

图19 新疆伊犁乌孙土墩墓出土魏晋时期陶钵(岳峰主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

在毗伽可汗宝藏中大量出现(图16),再次证明这两类器皿属于突厥艺术。

突厥单耳鼓腹罐起源甚早,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东汉匈奴墓就随葬了这样一件单耳鼓腹鎏金银壶(图17),韩伟和法国学者戴迪野(Christian

Daydier)认为产于罗马帝国东方行省叙利亚,孙机先生则认为产于吐鲁番地区(Han Wei and Christian Daydier, Ancient Chinese Gold, Les Editions d' Art et de Histoire, ARHIS, 2001, p109, fig. 266; 孙机:《大通银壶考》,《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3期,35-40页)。其实,这件鎏金银壶属于匈奴人创造的草原艺术,制作工艺亦为草原帝国历代工匠所传承(安英新:《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文物》,《文物》1999年第9期)。

这种单耳鼓腹银壶是草原金银器中最古老的酒具之一,突厥人不仅随葬墓中,而且雕刻在墓旁石人上。我们怀疑它就是史书中提到的突厥酒器“大罗便”,是突厥人用来喝马奶酒的(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190-191页)。《通典·突厥传》记载:“大罗便,酒器也,似角而粗短。”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中发现的突厥式单耳鼓腹罐,正是一种形态“粗短”的突厥酒器。

毗伽可汗宝藏中还有一种扁平的金钵(图18),以前见于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在新疆伊犁乌孙土墩墓中发现过类型完全相同的陶钵(图19),年代约在魏晋时期。这个时期,这种金钵在中亚和西域诸国广泛流行。楼兰LE城附近新发现的西晋壁画上有个贵族女子,手上就拿着这种金钵。这种制作工艺相对简单的器皿似乎不需要从外国进口,很可能是草原工匠在突厥本土制作的。

总之,毗伽可汗宝藏中草原艺术风格的金银器应为突厥工匠在本地制作的,生动展示了突厥人对匈奴、乌孙等草原民族的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粟特式金银器

粟特人是中世纪著名商业民族,被史书形容为“利之所在,无所不到”,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一直在他们操纵之下(《旧唐书·西戎·康国传》)。在唐代史书中,粟特人常按他们在中亚所居城市而称为“昭武九姓”,包括康(撒马尔干)、安(布哈拉)、石(塔什干)等十余个姓氏。昭武九姓之“九”乃言其多,并非只有九个姓氏(季羨林等校

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

公元6世纪中叶，粟特使团在突厥、波斯、东罗马、中国之间频繁进行穿梭外交活动。其中，一个粟特使团的头目名叫Maniach（摩尼亚克），多次代表西突厥可汗室点密出使波斯和东罗马（格鲁塞〔法〕著、魏英邦译：《草原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5—108页）。在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许多粟特人为突厥人撰写书信或契约，时称“译语人”。突厥可汗派往中原王朝的使者当中，许多人并非突厥人，从姓氏看，实乃“昭武九姓”胡人。

突厥汗国时期，许多粟特人从中亚移居蒙古草原。第一突厥汗国灭亡后，突厥诸部落纷纷南下黄河流域，在今天宁夏、陕西和内蒙古交界地带定居，史称“六胡州”。研究者发现，从突厥流亡六胡州的一些部落民并非突厥人，而是侨居突厥汗国的粟特移民（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71—82页）。粟特人具有千年文明史，他们对突厥人的影响相当大。突厥人本无文字，突厥第一汗国时期，突厥人以粟特文为官方文字。突厥第二汗国时期，突厥人开始创立自己的文字——突厥文，但是仍采用粟特文的拼音文字体系。

唐先天元年（712）九月，东突厥远征中亚，击败七河流域的突骑施，俘杀突骑施可汗娑葛。大部分突骑施部落投降突厥，少数部落则向锡尔河、粟特和铁门方向逃亡。东突厥军队在移涅可汗、噉欲谷、默棘连（即毗伽可汗）和阙特勤率领下，渡过锡尔河，经过粟特领地，远至阿姆河畔的铁门。712年秋冬，驻守撒马尔干城的阿拉伯军队和盟军与移涅可汗部发生武装冲突，最后，移涅可汗和噉欲谷的下属部队掠得大量金银和女子返回蒙古草原（克利亚什托尔内〔俄〕著、李佩娟译：《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154—179页）。因此，粟特对突厥的影响还表现在金银器制作工艺方面。

毗伽可汗宝藏中的许多金银器皿，显然与粟



图20 毗伽可汗宝藏中的单把细颈金瓶



图21 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唐墓出土粟特胡瓶

图22 河北宽城金银器窖藏出土粟特胡瓶（宽城县文保所：《河北宽城出土两件唐代银器》）



图23 毗伽可汗宝藏中的单把金杯



图24 唐代单把金杯（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

特金银器一脉相承。例如：单把细颈金瓶（图20），就模仿粟特金银艺术的胡瓶。这种胡瓶本为希腊罗马人所发明，西方艺术史家谓之Ewer（水罐）。在西方艺术影响下，波斯和中亚后来大量生产胡瓶。据史书记载，最早传入中国的胡瓶，是东罗



图25 毗伽可汗宝藏中的
镶嵌宝石的金耳环



图26 中亚粟特壁画上佩戴耳环的女供养人

马胡瓶，时称“胡饼”。《前凉录》（《太平御览》引）记载，“张轨时，西胡致金胡饼，皆拂林作”。崔鸿《十六国春秋》卷七二亦载：“是时，西胡致金胡饼，皆拂林作”。“拂林”即中国史书对东罗马的称谓，故知西晋时期中国就从东罗马进口过胡瓶。中国古代不以金银为器，直到唐代初年，胡瓶在中国仍是稀有之物，唐朝皇帝往往用来赏赐有功之臣。《旧唐书·秦叔宝传》说：秦叔宝“破尉迟敬德，功居最多。高祖遣使赐以金瓶。”

粟特人长期操纵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大概由于这个原因，从西方输入唐朝的胡瓶多为粟特胡瓶。内蒙古东部敖汉旗李家营子1号唐墓（图21）以及河北宽城金银器窖藏内（图22）都发现了粟特胡瓶（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第2期，111—116页；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321—332页）。

毗伽可汗宝藏中有不少粟特艺术风格的胡瓶，为了解粟特金银器在蒙古草原的传播提供了新材料。此外，毗伽可汗宝藏中的单把金杯（图23），亦模仿粟特金银器的单把杯，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也发现此类单把金杯（图24）。由于这类金杯在粟特壁画上出现，所以俄国学者马尔沙克（Boris Marshak）将其归入粟特流派的银器（Boris Marshak, *Sogdian Silver*, Moscow, 1971, T.25 and T.45）。

尽管毗伽可汗宝藏中许多金银器颇具粟特艺术风格，但是制作工艺显得比较粗糙，也许是突厥工匠模仿粟特金银器制作的，本文姑且称作“粟特式金银器”。毗伽可汗宝藏中的镶嵌宝石的

金耳环（图25），也属于粟特艺术品，中亚粟特壁画上的粟特女供养人就佩戴这种耳环（图26），年代在公元7—8世纪，现藏杜尚别塔吉克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田边胜美、

前田耕作〈日〉：《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15·中央アジア卷》，小学馆1999年，图版223）。毗伽可汗宝藏中还发现一种透雕金花（图27），俄国考古学家以前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克贝希姆古城发现过类似的透雕金花（图28），只是制作工艺更为精细。据俄国学者斯塔维斯基考证，年代约在公元6—8世纪（斯塔维斯基著、路远译：《古代中亚艺术》，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阿克贝希姆古城就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碎叶城。这座古城本为中亚粟特人的聚居地，并入唐朝版图后，成为安西四镇之一（张广达：《碎叶城



图27 毗伽可汗宝藏中的粟
特宝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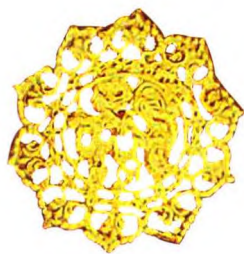


图28 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
希姆古城发现的透雕金花

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5期）。碎叶城出土透雕金花精美之极，无疑是粟特工匠所为。相比之下，毗伽可汗宝藏的透雕金花就显得比较粗糙，也许是突厥本地工匠模仿粟特艺术品制作的。

据报道，毗伽可汗宝藏中的各类宝物达4000多件，我们如今能够见到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吉光片羽，不足以深入了解突厥文化的实质性问题。尽管如此，这些新发现还是披露了不少前所未有的第一手资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于突厥文化以及中世纪草原艺术的知识。■